

江西通史

3

钟起煌 主编

魏晋南北朝卷

周兆望◎著

江西出版集团·江西人民出版社



主 编 钟起煌
顾 问 周奎书
副主编 邵 鸿 彭适凡(常务) 方志远

江西通史

江西出版集团·江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西通史·魏晋南北朝卷/周兆望著.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8. 1

(江西通史/钟起煌主编)

ISBN 978 - 7 - 210 - 03655 - 5

I. 江... II. 周... III. 江西省 - 地方史 - 魏晋南北朝
IV. K29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28782 号

江西通史·魏晋南北朝卷

周兆望 著

江西出版集团·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20 插页:4

字数:330 千 印数:1-3200 册

ISBN 978 - 7 - 210 - 03655 - 5 定价:45.00 元

江西人民出版社 地址: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

邮政编码:330006 传真电话:6898827 电话:6898893(发行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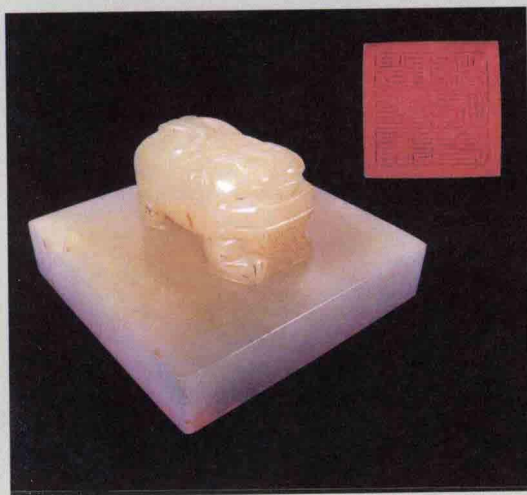
网址:www.jxp-ph.com

E-mail:jxp-ph@tom.com web@jxp-ph.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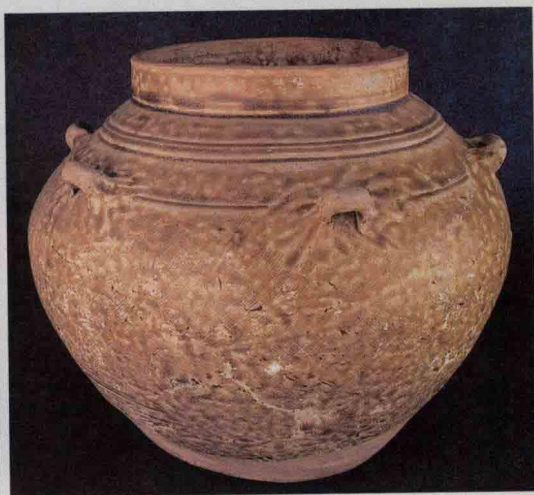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东吴时期的青瓷虎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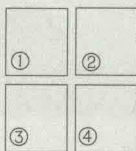
龙虎山天师道张天师玉印



青瓷六系罐（三国东吴高荣墓出土）



- ①南朝时期的琥珀异兽
②长鼓舞人青瓷博山炉（丰城荣塘出土）
③江西南昌出土的西晋时期的谿千铃铜印
④东晋宴乐漆盘



渊明小像



陶渊明像



陆修静像



《归去来兮图》(元代 何澄)



陶渊明祠



东林寺开山祖师慧远



庐山东林寺远公塔院



东林寺全景

《江西通史》编辑委员会

主 任 钟起煌

副主任 钟健华 傅伯言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方志远 孙家骅 邵 鸿 林学勤 彭适凡

编委会办公室

主 任 孙家骅

副主任 游道勤

工作人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琴红 王紫林 曾 敏

常务编辑

林学勤 徐建国 游道勤

江西通史
——魏晋南北朝卷——

周兆望
著

总序

钟起煌

世界上的很多事情都是由机缘而起因执着而成,包括我们这部《江西通史》。

说由机缘而起,是因为这件事情的发生几乎纯属偶然。2002年夏天,我和彭适凡、孙家骅同志谈到江西悠久的历史、谈到江西辉煌的文化,因而产生了组织专家编撰《江西通史》的设想,彭、孙二位当即认为此举当行而且可行。

说因执着而成,是因为一旦有这个想法,而且认为这是一件研究江西历史、弘扬江西文化的重要工程,就决心去做。为此,我征询了周銮书同志的意见,并邀请邵鸿和方志远同志共商此事,得到他们的热烈响应。2002年10月18日,在江西省文物局和江西师大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共同举办的全省文博教育成果展示与经验交流会上,我向大会通报了编撰《江西通史》的意见,引起全体代表的热烈反响,大家用长时间的热烈掌声表示支持,认为这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挖掘和整理江西传统文化、推进江西经济文化建设的一大盛事。有了这个共识,12月13日,准备工作进入实质性阶段。在我的主持下,召开了有关专家和编辑人员的联席会议,对编撰《江西通史》的指导思想、作者人选、工作日程、成果形式等具体问题展开了比较细致的讨论。2003年2月15日,召开了第一次编撰工作会,《江西通史》的编撰工作就此正式启动。

虽然说是机缘和偶然,但新的《江西通史》的编撰,实具备诸多因素和条件。

一、江西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根据最新的考古发现,在江西这块土地上,人类的活动至少已有20万年历史,它是中华民族发展史和古代文明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唐末五代以来,随着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江西遂为

全国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省份之一,其物产之富、人才之众,举世瞩目;进入20世纪,江西又因为中央苏区的建立而成为全国苏维埃运动的中心。很难想象,在十分漫长的时段里,没有江西的中国历史将会是什么样子。

二、文献与实物资料丰富。江西既有“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誉(唐王勃语),又素称“文章节义”之邦(宋司马光语)和“人文之薮”(清乾隆帝语),存世官修私撰文献极为丰富。近年来一系列的考古发现,既可弥补文字记载之不足,更可与文献资料相互印证,为编撰《江西通史》提供了可供参考的实证材料和科学依据。

三、前期成果丰硕、学术队伍整齐。老一辈的历史学家仍然健在,他们不但学术积累深厚,而且对研究江西历史有着强烈的责任心;中青年学者正趋成熟,他们继承了前辈学者的严谨学风,又吸收了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技术,思维敏捷,勇于创新。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这些年来已有大批高质量的有关江西历史的学术成果问世,这些成果涉及江西历史的方方面面,为编撰《江西通史》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四、政治环境宽松、经济形势发展。盛世修志是中国的传统。改革开放以来,政通人和,国泰民安,江西经济和全国一样,有较快速度的发展。这为编撰《江西通史》提供了自由的学术气氛和比较充裕的财力保证。近年来,江西的学术事业和出版事业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连续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和国家图书奖、中国图书奖,给江西文化艺术界和学术界以振奋,也引起了各兄弟省市的关注。这些成就的取得,为我们组织大规模著作的编撰工作提供了经验。而周边各省如湖北、湖南、浙江以及其他省市新编通史的纷纷问世,对《江西通史》的编撰是有力的推动,也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五、从我个人来说,当时也恰恰能分出一些精力和时间来抓这件事情。于是尽力协调各方面的关系,为作者们、编者们排除各种障碍,以保证这项伟大工程的圆满完成。

四年来,《江西通史》的编撰工作得到了各方面的关心和支持。黄智权、吴新雄省长亲自过问此事并指示有关部门给予支持,省政协将其作为一件大的文化事业进行推动,省社联将其列为重大科研项目,江西师大、南昌大学、省社科院、省文物局、省博物馆和省考古所等有关单位也对参与编撰的专家们给予各种便利,出版部门派出了强大的编辑班子并准备了足够的启动和出版资金。特别要指出的是,各位作者在繁忙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中,能够将《江西通史》的

写作列入重要的工作计划并全身心地投入。我在第一次全体编撰会议上指出,《江西通史》的编撰是一项挖掘和弘扬江西历史文化传统的千秋事业,希望作者和编者将其视为自己学术生涯中的重大事业。事实证明,作者和编者们后来都是这样要求自己的。正是因为有了各方面的支持和全体编撰人员的共同努力,11卷的《江西通史》才能顺利地完成书稿并得到如期出版。

明代中期,随着区域经济文化的发展,修撰地方志成为一大文化现象。各省、各府乃至各县的省志、府志、县志大量涌现。此后遂为传统。盛世修志也不仅仅限于修前朝历史,更大量、更具有普遍意义的乃是修当地地方史。具有全局意义的江西省志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产生的。自明中期以来,江西整体史著作已编撰过多部,其中著名的有:林庭俺《江西通志》(37卷,明嘉靖四年),王宗沐《江西省大志》(8卷,嘉靖三十五年;万历二十五年陆万垓增修),于成龙、杜果《江西通志》(54卷,清康熙二十二年),白潢、查慎行《西江志》(206卷,康熙五十九年),高其倬、谢旻《江西通志》(163卷,雍正十年),刘坤一、刘绎、赵之谦《江西通志》(180卷,光绪七年),吴宗慈、辛际周、周性初《江西通志稿》(9编,民国三十八年)。上世纪末,又有许怀林的《江西史稿》(1994年,江西高校出版社),陈文华、陈荣华主编的《江西通史》(1999年,江西人民出版社)问世。这些著作在保留江西历史遗存、挖掘江西历史文化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如何在充分吸取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有所创新,是对新编《江西通史》的重大考验。

为了使新的《江西通史》更具有时代特色和历史价值,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我们对这部著作提出了以下的要求。

一、中国历史是一个整体,我们在研究任何地方历史的时候,都不能脱离这个整体。因此,正确认识各个历史时期江西在全国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就显得尤其重要,必须充分关注江西与中央、与周边地区的关系,不溢美、不自卑,不关起门来论江西,将《江西通史》写成一部与中华民族的整体有着血肉联系的江西历史。

二、《江西通史》是系统记述和研究江西历史的大型学术著作,由众多学者共同参与完成。一方面,各卷是作者的个人成果,是作者最新研究成果的结晶,可以也应该有自己的风格和特色,所以希望作者精益求精,使其成为各自领域的学术精品。另一方面,甚至更为重要的是,它又必须是一个整体,是一部“通史”,所以全书11卷必须有统一的体例和统一的要求,在文风上一定要力求简

洁、明快。各卷作者务必服从整体、服从大局,使自己的作品成为整个《江西通史》的有机组成部分。

三、《江西通史》必须是一部真实、动态、有可读性的信史。所谓真实,是指史料翔实、言必有据。此“据”是经过考证后认为合理的,否则,“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孟子语)。这就需要每个作者既尽可能地系统爬梳和挖掘史料,又谨慎辨析和使用史料。所谓动态,是指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既将问题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又特别关注它的演进过程,因为即使是同一件事物,其状态和作用也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变迁而变化的。这就需要每个作者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阐释历史、去探讨历史演进的规律。所谓有可读性,是指应该用流畅的文字、叙述的方法写作,展示的是作者的观点和结论,而不是考辨的过程,它的体例是史书而不是论文。无图不成书。图文并茂是中国出版物的优良传统和重要特点,《江西通史》应该在尽可能的情况下,收集能够说明江西历史各阶段各方面状况的历史图片,以加强其历史感和可信度,同时也使其更具有可读性。

四、以人为本,以民为本,以基层社会为本。所谓以人为本,指的是要写成人的历史,以人的活动为描述对象,即使是制度、习俗,也应尽可能地有人的活动。所谓以民为本,指的是尽可能地站在大众的立场上来叙述历史、看待历史,更多地叙述大众的活动。所谓以基层为本,是因为地方史本身就是基层乃至底层的历史,要尽可能地揭示基层组织和底层社会的活动状况。在此基础上,充分重视统治者和社会精英对社会的主导作用,重视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特别是包括传统价值观念和现实政治制度等在内的上层建筑对个人、对大众、对底层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写成一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互动、国家权力与基层社会互动、社会精英与人民大众互动的历史。

11卷本《江西通史》即将付梓,我们希望它的出版能够成为江西历史研究的新的里程碑、能够成为江西文化史上的一大盛事。当然,能否达到这个目标,还要由读者和历史来检验。

引言

189年,董卓之乱发生,汉献帝受制于人,中国历史实际进入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自此至589年隋灭陈统一全国,前后历时4个世纪之久。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史上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具有自己许多独特的特点:政治上出现大分裂、大割据,各民族政权林立,南北长期对峙;战乱频仍,广大中原地区饱受战乱蹂躏,生灵涂炭,经济凋敝,社会生产遭受严重的摧残和破坏;民族关系上,出现民族大流徙、大激荡和民族大融合;思想文化上则是一个较为开放、弃旧图新、生机盎然的时代,各种新思想、新制度、新事物层出不穷。在这一历史大背景下,加之南方所受战乱相对较少,社会较为稳定,因此,江西和南方许多地区一样,获得了迅速发展的机遇,在社会经济、思想文化诸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和显著的进步。



汉末大乱,天下无主,各地牧守豪强纷纷拥兵称雄,割据一方,相互混战,“大者连郡国,中者婴城邑,小者聚阡陌,以还相吞没”^①。地处长江中游、战略地位重要而又物产富饶的江西更成为南北军阀共同垂涎的目标,河北军阀袁术、扬州刺史刘繇、庐江太守刘勋、广陵督笮融等人都曾对江西进行过激烈的争

^① 《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注引曹丕《典论·论文》,第89页,中华书局,1975。

夺,但是,他们都失败了。建安四年(199年)十二月,孙策夺取豫章郡,成了最后的胜利者。数年之内,孙氏占据江西全境。自此,除西晋短暂统一外,江西一直处于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六朝政权的相继统治之下。

六朝时期,江西行政区划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自199年孙策夺取豫章郡,至280年西晋灭吴,东吴统治江西首尾82年。郡县由东汉末的1郡25县增至6郡58县,除原豫章郡外,新增鄱阳、庐陵(今吉安)、临川、安成(今安福一带)4郡和庐陵南部都尉(行政级别与郡同),新增县邑33个,基本上奠定了现今江西省行政区划的基础。

两晋统治江西共140年(280—420年),其中西晋统治36年(280—316年),东晋统治104年(317—420年)。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江西在全国的地位日趋重要。西晋惠帝元康元年(291)置立江州。两晋江西全境共有7郡58县,基本上与东吴时期相当,而于太康三年(282年)改庐陵南部都尉为南康郡(今赣州市),县邑名称也有若干变动。

南朝时期,特别是梁末陈初,江西的行政建制有着重大的变化,显得极为混乱。就郡县而论,变化不大:刘宋为7郡54县;齐为7郡53县;梁增至9郡61县,新增豫宁、巴山二郡;陈为10郡59县,新增安乐郡。但江州所辖范围逐步缩小,而州的数量却不断增多。西晋怀帝永嘉元年(307年)置立湘州,桂阳郡从江州划出;宋孝武帝怕江州强大,于孝建元年(454年)置立郢州,又将武昌郡从江州割走。梁末陈初,由于战乱、南方土著酋豪崛起等原因,江州被分割为南江州、西江州、北江州;梁大宝元年(550年),以临川郡置宁州;承圣二年(553年),改鄱阳郡为吴州;绍泰二年(556年),分江州的临川、安成、豫宁、巴山4郡置高州;陈至德四年(586年),以鄱阳郡还属江州。这一混乱状况前后持续了十几年之久,直至陈朝统治稳定之后,情况才有所好转。江州的治所初居豫章(今南昌),东晋成帝后移治寻阳(今九江),梁末再迁豫章。

二

六朝时期,江西的战略地位日趋重要,这是又一重大变化。在秦汉大统一局面下,江西地处中部地区,战略地位无足轻重;而到六朝时期,其重要性便日益凸显出来。孙氏占领江西后,苦心经营,根本原因就在于江西战略地位的极端重要性。东吴为防蜀抗魏,以保持鼎足而立的地位,主要从两方面发挥自己

的优势：一是凭依长江天险，以此作为重要的军事屏障；二是大兴水师，立足于水战。而江西地处长江中游，赣北的寻阳形势险要，既是天然的军事屏障，又是训练水师、驻扎军队的军事重镇。赤壁战前，大都督周瑜奉命驻兵寻阳，大规模训练水师；赤壁之战中，孙、刘联军大败曹操，主要依靠的就是周瑜率领的三万精锐水师。周瑜之后，吕范、陆逊、陆抗、诸葛恪等大将相继驻屯柴桑（今九江市西南），常年在此驻有重兵。东吴之治所或都城曾几经迁徙：建安五年（200年），孙策始治吴（今苏州）；建安十三年（208年），孙权由吴徙治京口（今镇江市）；建安十六年（211年），徙治建邺（今南京市）；魏黄初二年（221年），孙权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吴黄龙元年（229年），孙权于武昌称帝；次年九月，回迁建邺；甘露元年（265年），孙皓又一度徙都武昌，一年后迁回建邺。孙氏自割据江东，凡治吴8年，居京口3年，都武昌9年，都建邺60年，其迁徙的范围不外乎今江苏和湖北境内。当其定都江苏境内时，江西则成为东吴政权向前开疆拓土、夺取长江中游的前沿基地。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十月，吕蒙“白衣渡江”，擒杀关羽，袭夺荆州，即从寻阳发兵。当它定都武昌时，江西又成为东吴政权的坚固后院，可随时提供充足的粮饷和兵员。江西之战略地位既然如此重要，东吴政权对之苦心经营便可想而知。

东晋时期，江州的战略地位显得更加重要。其时，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力量强大，时刻窥视江南，划江而守便成为东晋王朝对付北方威胁的基本国策。“江州，国之南藩，要害之地”^①。不仅江州之寻阳是防御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南侵的重要军事屏障，而且整个江州地处荆、扬之间的军事要冲，上可控扼荆州，下可屏藩京师，正如时人刘毅所说：“江州在腹心之内，凭接扬豫，藩屏所倚，实为重复。”^②江州所处的重要制衡地位，使它成为东晋门阀士族在长期的上下游之争中首先要控制的目标。再者，江州地区多流民，丰粮谷，乃兵甲所聚之地。在东晋门阀政治下，大族擅权，皇权驾空，谁能夺得江州，谁就能取得政治上的主动权，进而遥控朝廷，保持家族的最大利益。因此，终东晋一朝，司马氏皇室与大族之间，王、庾、桓、谢等大族相互之间对江州的争夺至为激烈。

首先控制江州的是号称东晋第一高门的琅琊王氏。王敦因坐镇武昌指挥平定杜弢流民起义军有功，被司马睿擢升为镇东大将军，加江、扬、荆、湘、交、

① 房玄龄《晋书》卷八一《刘胤传》，第2114页，中华书局，1974。

② 《晋书》卷八五《刘毅传》，第2208页。

广六州都督，江州刺史。司马睿称帝（即晋元帝）的第二年（318年），又以王敦为江州牧。王敦开始自选刺史以下官吏，利用荆、江二州的优越条件，极力壮大个人实力，逐渐骄横起来，遂欲专制朝廷，有问鼎之心。永昌元年（322年）正月，王敦以诛侍中刘隗为名，于武昌举兵作乱，反叛朝廷，图谋篡位，并很快攻破建康，逼晋元帝封他为丞相，仍领江州牧。次年，王敦再次举兵内向。直至太宁二年（324年），王敦病重，明帝才下令讨伐，将叛乱平息。王敦作乱期间，以从弟王舒为荆州刺史、王彬为江州刺史、王棱为豫章太守，始终把江州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晋元帝为削弱王敦实力，曾一度以陶侃为江州刺史，但未获成功。王敦之乱，虽自荆州发动，但其势力的形成，实始于江州。

王敦之乱后，明、成二帝相继将江州收归朝廷，先后以心腹重臣应詹、温峤为江州刺史。其时，陶侃出任荆州刺史，拜征西大将军，拥重兵居上流，温峤刺江州实为防遏陶侃。

咸和四年（329年）二月，苏峻之乱平定，颍川大族庾亮与琅琊王氏开始对江州进行争夺。这年四月，温峤卒，其军司马刘胤继为江州刺史。刘胤本非方伯之才，在任纵酒淫乐，不恤政事，大殖财货，年底即被朝廷免职。后将军郭默乘机擅杀刘胤，司徒王导即用之为刺史，以图控制江州。太尉陶侃闻之大怒，即刻出兵斩郭默于军门，明帝下诏以陶侃都督江州，领刺史，使王导的愿望落空。咸和九年（334年）六月，陶侃卒，庾亮出任江、荆、豫、益、梁、雍六州都督，领江、豫、荆三州刺史，镇武昌，终于实现了控制江州的多年夙愿。庾亮刺荆、江二州共6年，咸康六年（340年）正月卒，其弟庾翼继为江、荆等六州都督。庾氏独占江、荆二州，使琅琊王氏坐困建康，动弹不得，王导心中愤懑。迫于王氏压力，庾亮临终前，主动举荐王羲之为江州刺史；庾翼也将江州刺史让给了王允之，这是庾氏所不愿意的。咸康八年（342年）正月，庾翼之弟豫州（侨州，治芜湖）刺史庾怿给王允之的封送了一坛毒酒，其用意不言自明。王允之立即察觉，并秘密上奏朝廷，结果庾怿反被迫饮鸩自杀。可见，王、庾明争暗斗之激烈。康帝建元元年（343年）八月，庾翼移镇襄阳，准备北伐，又以其弟庾冰为江州刺史。十月，庾冰卒，庾翼复督江州。穆帝永和元年（345年）七月，庾翼卒，江州刺史之职逐渐转入大族桓氏之手。从庾亮至庾冰，庾氏刺江州前后达11年之久。

桓氏继庾氏之后执掌朝权，世莅荆土，又控摄江州。桓温为荆、梁等4州都督，自领兵居上游，而以其弟桓云、桓冲相继为江州刺史，居兵寻阳。自哀帝隆和二年（363年）至孝武帝宁康元年（373年），桓冲刺江州凡10年。桓冲之后，先